

中国当代史研究 (二)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王海光

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

杨奎松

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冯筱才

“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

刘一皋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

沙青青

接生的故事

贺 萧



《公报》可以做到「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喜出望外，很快即表态：「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 在官方档案、报刊报道、历史记述、访问、回忆，以及大多数被文学化的相关作品中，「穷棒子社」故事都与国家历史高度同构，村庄史就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苏联因素」，但不是对苏联户口管理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共在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中自然延伸的结果。

● 毛泽东点名邀请王芸生北上，并许诺《大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编

中国当代史研究

(二)

韩 钢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史研究. 2 / 韩钢主编; 王海光等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08-1034-3

I. ①中… II. ①韩… ②王… III. ①中国历史: 现代史—研究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6897 号

中国当代史研究 (二)

作 者 韩钢 主编 王海光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034-3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首语

这一辑关注的重心仍在 1950 年代，努力重建更逼近真实的共和国第一个十年的历史。

在“专题研究”栏目，我们编发了七篇文章，涉及户籍制度、报人和报纸的改造、公私合营、乡村合作化、农业技术改革、农村等问题。从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政权在建立之后最初十年改造社会的历史轨迹。

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不少都能讲出几个跟户口有关的故事，或庆幸，或伤感。覆盖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对国民和国家的影响至深至远，迄今仍是热门的时政话题。王海光的《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梳理了这个制度的由来和演变。他认为，在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过程中，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是两个关键因素，二者造成农村社会紧张，农民大批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压力剧增，政府因此采取种种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并逐渐把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功能纳入到了户籍管理之中，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方面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划分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以行政手段强行建立起了城乡隔离带，形成了“户警一体”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分治的管理方式，最终将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了户籍管理制度。

曾标榜“不党不私”的《大公报》在新社会和新制度下如何生存，是杨奎松的《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讲述的故事。文章以细腻的笔法呈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在《大公报》政治命运危若垒卵之机，王芸生临机应变，逢凶化吉，使上海《大公报》得以继续发行；王芸生又因其在“三反”运动中

的出色表现，以及《大公报》在工商界中的影响力，最终挽救了上海《大公报》的历史。在作者看来，尽管《大公报》从此再也不是过去的《大公报》了，但至少它又一次保住了这块招牌，而且还得以存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公私合营的历史是个老话题，但冯筱才的研究显出独到之处。他更关注的是公私合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变化”与“差异”。他在《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中，以上海商人为考察对象，阐释了公私合营政策的演变过程：初期的“公私合营”主要与接收“官僚资本”有关；“三反五反”时期，政府用合营的办法抵充私企负债，公私合营企业因此增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政府选择性地将一些“有前途”的大中型私营企业乃至行业逐步加以吸收，以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到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转向激进，全国各地掀起“合营高潮”，“公私合营”成为各级中共干部非理性“政绩数字竞赛”的平台。

新旧政权的更替是以城市易手为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接管城市是中国当代史的起点。林超超在《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一文认为，这足以应当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事实上，近些年来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国外研究经过了几次范式转换，国内学界则注重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但是国内研究大多还只是满足于历史真实的发现和梳理，而缺乏对既有的史观、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林文预期，进行实证性研究，还原“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状态，以便寻找众多历史面相背后的合理逻辑，这些可能是未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突破中国当代史研究瓶颈的重要方法。

与前述几篇论文关注精英阶层和城市生活不同，刘一皋的《“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和葛玲的《水旱之争的历史审视》，把目光对准了乡村。河北遵化县的农民王国藩组织了一个只有一条瘸腿驴的农业合作社，人称“穷棒子社”。因为最高领导人的赞誉，“穷棒子社”在1950年代闻名遐迩。刘文讲述的不是“穷棒子社”的故事而是故事的故事，梳理各种“穷棒子社”故事的叙述，分析

其中的缺失、变化和逻辑冲突，揭示权力因素对于故事叙述内容、取向的影响和所造成的深刻社会裂痕，以及在新时期社会转型中的惯性冲击，并指出了依据既有材料进行直线式研究的缺陷。葛文涉及的是1950年代的地方稻改运动。1950年代，地方政府在皖西北地区推行旱地改水田的稻改运动，在只有种植旱地作物传统的地区强行推广水稻种植。面对自上而下的稻改任务，乡村基层干部与农民基于传统种植经验表达了普遍的抵制态度；对来自底层的抵制，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执行者则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手法强力推动之。文章的意义在于，从技术层面的视角展示了1950年代的多面向改造的历史。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以天津地震日记为例》，是本辑唯一一篇不属于讨论1950年代问题的论文。作者沙青青透过一位天津高中学生1976年大地震前后大约半年的日记，窥见了“文革”末期特殊的社会氛围与个人心态在遭遇突发自然灾害时，究竟是如何发生异变的。相对于宏大叙事的文献，日记、信函这类私人化的史料常常更能真实而直接反映国民的心理和情绪，因而颇具研究价值。在当代史的研究中，这类文本愈来愈为研究者重视。这也是我们刊发本文的意图所在。当然，任何史料对历史的记录都难免有局限甚至错讹，使用私人化的历史记录同样应当审慎，一如作者所说：“在利用这类历史材料前，同样需要研究者先进行仔细的解读与考证。”

在“外稿选译”栏目，作为性别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学者贺萧的文章通过讲述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的故事，试图回答国家公开宣扬的各种政策，和当时国家机构内外的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一切的理解，以及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回顾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些人所想起的之间，分别是什么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学术评论”是一个新栏目，刊载了萧延中的《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草图》。作者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近期毛泽东晚年研究状况的作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评价性报告。他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主流意识形态”、“否定批判取向”、“‘新左翼’研究论述”和“历史主义学派”四个

流派，文章在对各家观点的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进行初步梳理后指出：在当下的中国，“毛泽东”已演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而“毛泽东问题”实际隐含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正当政治秩序的一种愿景。

“回忆和口述”和“史料辑录”栏目分别登载了《怪诞莫名法官路》、《一位中学教师的整风笔记》，或为事后的记忆，或为当年的笔记，都具有史料的性质，给读者提供了关于那个年代历史的个人信息。

编者

2010年4月

目 录

卷首语

专题研究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 对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形成建立过程的考察……王海光 3

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

- 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杨奎松 49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冯筱才 91

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

- 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林超超 139

“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刘一皋 164

水旱之争的历史审视

- 1950年代皖西北稻改中的政府与农民……葛玲 200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以天津地震日记为例……沙青青 235

外稿选译

接生的故事

- 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婆……贺萧 257

回忆和口述

- 怪诞莫名法官路……张思之 283

史料辑录

- 一位中学教师的整风笔记(一九五八年)…………… 309

学术评论

- 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 萧延中 361

书评书介

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 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 391

龙应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394

贾植芳著:《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 397

李思慎著:《李立三后半生——前中央常委及中央秘书长、

- 中国工运先驱》…………… 400

专题研究

中国当代史研究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对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形成建立过程的考察

王海光*

摘要 中共的户籍管理工作首先是从接管城市开始的。最初的户籍管理功能主要是实现新政权的有效统治，是公安保卫工作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在镇反运动中，在城市和重点地区建立了户口登记制度。其功能主要是对嫌疑人员进行政治控制，维护社会治安，对人口迁徙流动没有加以限制。1953年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建立全国城乡户籍制度的迫切性凸现出来了。其中，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是两个关键因素。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农村社会十分紧张，农民大批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压力剧增，政府采取了种种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并逐渐把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功能纳入到了户籍管理之中。户籍管理的重心开始由政治控制向社会控制偏移。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工农收入差距越发拉大，在短缺经济下的城乡冲突越来越激烈，政府阻止农民进城的措施也越发严厉起来。政府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方面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划分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以行政手段强行建立起了城乡隔离带，形成了“户警一体”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分治的管理方式，最终将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了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在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建立。在1960初经济调整中，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 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关键词 户籍制度 社会控制 人口流动 城乡二元结构

引论：中国当代户籍问题的由来

户籍制度是政府运用相关行政手段对所辖人户进行登记和管理的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法律制度。学界一般认为，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人口基本信息的有关法律制度。如姓名、年龄、民族、职业、教育程度、亲属关系、法定地址，以及出生、死亡、婚姻、领养等内容，类似西方社会的民事登记；广义的户籍制度不仅是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而是包括与人户的身份、职业、迁徙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①中国户籍制度概念，一般都是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意义上的广义的户籍制度。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从秦汉的“编户齐民”发展到明清的保甲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基本功能是通过人口统计，“人户以籍为定”，提供分配土地和征发税赋徭役的依据，强制百姓履行为国家服役的义务，是皇权专制主义“纳贡制度”的法律体现。同时，这种和土地制度密切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也为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口系于户、户著于地”的传统户籍制度下，以编户为单位，把血缘和地缘紧密地结合起来，提供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实现安土重迁等诸项社会整合功能，使中国农耕文明具有周而复始的系统稳定性。^②

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以土地税取代了人口税，“滋生人户，永不加赋”，将户籍与赋税剥离开来。利用户籍制度建立身份等级的做法，在清代也大为弱化，取消了过去匠户身份。户籍的赋税功能退减后，保甲治安和人口统计功

^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参见：俞德鹏著：《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导论部分；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页；陆益龙著：《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② 《汉书》提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意为：治理国家之道，是以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为根本）。宋昌斌认为：这八字箴言是以后历代户籍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参见宋昌斌著：《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能凸显出来了。保甲制度兼有乡村基层组织和民兵的双重性质，可以将各色人等编入其中，形成一个维护社会治安的网络。依保甲册籍统计人口，也较之过去赋役制度的人口编审能更准确地反映人口数据。保甲户籍制度虽表现了逐步向人口统计方向发展的趋势，但仍需要为政府承办钱粮杂役等事务，对民众的人身束缚没有彻底改变。在王朝政治下，户籍制度不能被附加其他社会职能，成为政府役使人民的首选工具。

现代户籍制度是建立在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之上的人口管理制度，意味着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臣民身份到公民身份、从人身依附到独立人格的转变。建立现代户籍制度是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在20世纪初年，晚清政府被迫预备立宪，中国即开始了从传统户籍制度到现代户籍制度的转型。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更是把现代户政建设作为“训政时期”国家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即使战乱时期也没有停顿，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户籍法律制度体系。公民的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基本实现。^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是指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法定标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在这个户籍制度上，长期附着了粮油供应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十几项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城乡隔离体系，限制了公民迁徙自由，堵塞了农村人口迁往到城镇的道路，以保障城镇人口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这项制度将全体国民分割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两大社会集团的户籍身份，在古今中外的世界范围中都是罕见的，人数最多的农民实际上长期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可以说，这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城市与乡村建构起来户籍壁垒的同时，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建构起了几乎同样严格的壁垒。包括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流动，也是被控制的。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人们的活动被限定在特定的地域（单位）范围内，市民和农民的身份不同只是在国家新的“编户齐民”下的待遇差异，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名存实亡。^②中共执政以后，也曾承认人民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基本权利。它之所以遭到颠覆和阻断，相当程度上也与苏

^① 有关晚清至民国中国现代户籍制度演进的概要情况，可参见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一书。

^② 在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形式上仍旧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权利和自由居住等项权利，到1975年重新修订颁布的宪法中，连这一形式上的自由权利也被取消了。

联制度的影响有关。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与苏联、东欧等国有很深的体制渊源，都属于治安户籍制度的类型。在户籍管理上具有“户警一体”的共同特征，都是由警察机关负责，警察掌握户口登记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管制敌对势力和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相同功能。而且在斯大林模式的户籍制度建立过程中，农业集体化政策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斯大林模式的户籍制度创立于上世纪30年代。当年，苏联以国家暴力的手段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在这场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为了镇压反抗者，发明了消灭富农的特殊移民政策。^①这一政策，不仅消灭了富裕农民，而且摧毁了整个乡村经济，直接后果是造成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为造成的大饥荒。农村各处爆发骚乱和暴动，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成千上万的饥民逃离了集体农庄，四处颠沛流离，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为了阻止饥饿的农民大举涌入城市，斯大林恢复了早已废弃的沙俄时代的国内居民证制度，全面实行严格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1932年12月27日，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苏俄建立统一居民证体系和强制性居住许可证法令》，并于1933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③

苏联居民证的发放范围最初限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1933年4月，又扩大到所有的市镇、工人居住点、国营农场、农机站所在居民点、部分大城市郊区和西部边境地区。居民证的登记内容主要有九项，分别是姓名、出生时间、出生地点、民族、家庭状况、社会地位、服兵役状况、居住许可证、发证单位签章，有效期为3年。每个居民证上加盖有居住许可证的印章以显示持证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信息，拥有当地居住许可证是就业、教育、发放生活配给卡和享受其他社会福利的法定凭证。广大农民是没有居民证的。如需要外出，必须在当地村苏维埃开具外出许可证。进入居民证管理区后，须在24小时内到所到地政府部门申请

^①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迁徙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消灭、迁徙和驱除富农的运动。沈志华执行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1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页~607页。

^② 苏联1932年至1933年间的大饥荒。据估计，苏联全盘集体化至少造成了1000万人的死亡，其中有一半死于大饥荒。参见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29页。

^③ 接栋正：《国外民事登记制度及其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第30页；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批准，必须在3日内离开。如违反规定和丢失居民证，将受到罚款、强迫劳动和监禁的严厉惩罚。^①居民证制度的实行，用行政手段强行把城乡分割开来，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又回归到了过去农奴制的境地。

苏德战争爆发后，实行了更严格的居民证管理制度。1940年9月1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1667号决议。规定一个人要从居住的城市、地区外出，除了要带居民证，还必须要有当地公安、安全甚至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通行证。这种在战时状态的限制措施在斯大林生前一直没有取消。^②

由上可见，苏联的居民证与中国后来的城镇户口具有同样的功能特点。在户籍制度的管理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通过警察机关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进入城市进行严格控制；都是从政治控制的手段演变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农民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实际上处于“二等国民”的身份地位。农民转变身份的可能只有招生录取、招工录用、提干、参军等几条有限的途径。

苏联和中国采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政策演变，也是在同一个历史逻辑下发生的：由于工业化的内部积累而引发了粮食供给不足，由于粮食供给不足而加速推进农村集体化，由于激进的集体化政策引发了农村社会的恐慌，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而使执政者不得不匆忙以强制手段构建起了城乡二元壁垒。这正是说明了推行斯大林体制的制度路径问题——计划经济必须把人们迁徙和居住的自由权利一并“计划”进来。在这个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一路上弥漫着消灭富农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气息。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苏联因素”，但不是对苏联户口管理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共在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中自然延伸的结果，虽然其性质和管理逻辑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管理方式和管制程度上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人口土地状况、工业化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造成的差异。相对中国而言，苏联的工业化程度高，人口基数比较小，所能提供给农民转换身份进入城市的出口自然会更大一些，对人口迁徙的户籍管束也要宽松一些。这种同质性的不同程度差异也反映在东欧各国对苏联居民证制度的移植上。

如果从中世纪传统来看，中国农民的境遇显然要比俄罗斯农奴优越很多。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可以自

^① 接栋正：《国外民事登记制度及其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第30～32页。

^② 闻一著：《回眸苏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由买卖，耕作效率极高。虽然也有军户、乐户、匠户、灶户等世袭职业身份和社会贵贱等级，但与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动弹不得的俄国农奴制粗放式经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显然，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当代户籍制度不仅是延承和变通了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的某些特点，也是移植了沙俄时代居民证制度的某些特点。

从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存在着巨大的历史悖论。这个以城乡二元分割为特征的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建立，既不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自然延续的结果，也不是对苏联、东欧的人口管理模式简单的制度移植，更不符合党在革命时期所主张的人民民主的共和理念。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对农民的重视程度远胜于苏共和中国其他政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高度肯定农民，赞扬“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①但在进入城市之后，短短几年中，却反而采取了把农民堵在城外的政策。这个结果绝非中国共产革命者的初衷。那么，这项制度生成的历史社会条件是什么？传统与借鉴的制度路径是什么？继承与变异的诸项因素是什么？在制度选择中的内在历史逻辑又是什么呢？本文拟就此略作考察。

一、接管城市和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草创

中共政权建立户籍制度的最初实践，是从接管和建立城市政权中开始起步的。在接管城市和维护城市治安的过程中，中共很快意识到户籍管理对新政权执政的重要性。

中共过去是在农村根据地环境进行战争动员，发展壮大起来的。因农村社会成分单纯，同质化程度高，中共对民众的组织动员活动不需要建立户籍制度。城市人口集中，成分复杂，流动性大，社会治安问题多，如果不能准确掌握人口的数量和变动情况，城市的治安秩序和各项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中共在抗战后相继占据了一些大中城市，很快认识到建立户籍制度对维护接管城市治安秩序的重要性，开始了建立户口管理制度的最初实践，并相继总结了一些经验。如1946年7月13日晋冀鲁豫公安局印发了邯郸市建立户籍管理制度在维护新解放城市治安秩序的经验。期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5页。